

## 从毛坝关出发

杜光辉

白喝完，脑袋发软，两腿发软，晃荡着走在鞋底磨了千百年的条石街道上，条石被岁月磨得锃明瓦亮，脚步落在上边，缝隙里溅出带有臭味的泥水，熏得我们呕吐。狗吃了我们的呕吐物，趑趄趑趄跟在我们后边，期望再吃到人类没有消化的酒肉。

我天天琢磨，就这样走过自己的一生？琢磨的结果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。

于是，自杀的念头时常闪现在思维中。多少个白天夜晚，我趴在桥边的栏杆上，望着桥下深涧的流水，巨石、阴冷的气息腾升到桥面上，桥面至沟底的距离大约七八十米。我把计算自由落体的公式琢磨出来，S 代表物体下落的高度，G 代表重力加速度，T 代表时间，如果从桥面跳下去，只需一点零两秒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真正想自杀的人，绝不会自杀前计算从实施到死亡的时间。促使我苟延生命的是我的父母，我如果离开这个世界，势必给他们造成致命的打击。为了父母活下去，我必须活下去。

### 一

一个完全的偶然，我走进万源县文化馆，那是当年闹革命的根据地，好像是徐向前、许世英的军部。陈旧的书架上摆放着十几本杂志，我拿起一本《新体育》，里面有篇小说《含着草》，是名叫张浩的作家写的。内容是一个很有实力获得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，为了培养更年轻的选手，全心做好陪练，年轻选手夺得世界冠军，一下子就成了姐姐和我谈恋爱。文笔优美，故事感人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多年后，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，才知道张浩在若干年后，其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

我觉得自己在聆听张浩给我讲述美好的人性。我突然萌发出这样的想法，耳朵对于写作者完全是多余的器官。而且，用嘴和耳朵进行交流，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，用书信交流就没有距离和时间的限制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认为张浩大姐催生了我的文学生命，尽管我至今都没见过她。

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要拯救自己只能靠自己。我的父母、亲友中，连个小组长职位的人都没有，靠他们拯救我等于让蚂蚁拖大象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。我决定开始写作，不能让自己的抓着自己的头发拽出泥潭？

我在本馆读书的年龄，参军入伍，驾驶军车奔驰在青藏高原，没有机会读书。

我知道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拼命读书，恶补没有读书的欠缺。但是，领导规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领袖著作，读其他书籍是资产阶级活动。

就在我立下文学创作的志向时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不搞阶级斗争了，不扣资产阶级帽子了，书籍大量出版了。

我的文学命运太好了，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为了读书，到了周末，天刚破晓，我就跑到车站值班室，等待停车的货列，爬到尾部的守车上，所有的列车都在万源站更换机车。我跑到万源县文化馆，为了多借几本书，借的时间长一些，就讨好图书管理员，帮人家买鸡蛋。毛坝关的鸡蛋五分钱一个，万源县城的鸡蛋八分钱一个，一篮子盛一百个鸡蛋，人家就节省三块钱。这可不是小数字，万源的月工资才二十多块钱。

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刚刚复刊，限量发行，掏钱也订不上它们。慢车上搞文化下乡。慢车在毛坝关会车时，我上到客车，找卖杂志的列车员。买到杂志后到下一站下车，顺着铁路步行回毛坝关，要经过三座 1000 多米长的隧道。到处是铁轨车道的垃圾，便饭、垃圾、腐烂的气味令人窒息。火车通过隧道时，如果不及时躲进安全洞，就有被卷进车轮下的危险。有次，我来不及钻安全洞，把身子贴在洞壁上，火车距离我一尺多远的距离飞驰而过。突然，车上蒙的篷布散开了，擦着我的鼻尖一闪而过，吓得我本能地爬到地上。如果篷布再张开一点，就会把我卷到车下，碎骨万段。

职工住房紧张，一间宿舍 4 个人，我无法看书写。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，有个存放扫帚的小屋，能坐一张桌子一张床，这是多好的书斋呀。我把里面打扫了，粉刷了，拉上电灯，找了把椅子，就坐在里面看书写。

大巴山的冬夜，寒风刺骨，坐到半夜，冻得难以忍受，就把被子裹在身上，身上的问题解决了，脚仍然刺痛。我找来工作灯，装上 150 瓦的灯泡，放在桌子下边，脚蹬在灯罩上。灯泡发出的亮光，夜里不觉得亮，第二天起床，两眼红肿流泪，看东西模糊。为了克服灯泡的强光，我找来黑铁纱网，罩在灯罩上，熬夜看书的问题解决了。

上班攀山查线，下班看书写作，成了我的主流生活。

我的阅读向更深更广的范畴延伸。

书籍把我带进了欧洲，让我了解了古希腊、古罗马、黑暗的中世纪、文艺复兴、现实主义文艺；书籍也把我带进了古代中国，春秋战国、隋唐时代、宋的纷乱、元的铁骑、明的治吏、清的腐败；书籍使我了解了宇宙之浩瀚，原子之渺小；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核、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。

春夜，法冷还暖的微风里吹来山林的清冽，走来了苏格拉底，他给我说知道自我无知的人才是最聪明的；走来了柏拉图，他给我说风的冷暖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感觉，这是哲学的道理；走来了亚里士多德，他给我说知是人类的本性，你爱读书，绝对没错；走来了还有泰勒斯、朗基努斯、阿基米德……

夏夜，清新的山风吹来了但丁，他在《神曲》里给我揭示了教皇统治的罪恶；吹来了薄伽丘，他在《十日谈》里给我说，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辜负青春；吹来了雨果，他在《巴黎圣母院》里赞扬丑人阿西莫多的善良，抨击副主教洛德德貌岸然的蛇蝎心肠……秋夜，月亮在我的窗户里不动声色地踱走，月光星光连台灯的光，淹没了我。辉光里坐着康德，他给我讲二律悖反；坐着黑格尔，他给我说整个世界都应该讲究精神和信念；坐着罗素，他给我说，支撑人的生命有三种情感：对爱情的渴望，对知识的追求，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……

冬夜，山崖上的冰雪填满了我的窗户，寒冷透过玻璃，我连连打着喷嚏。陪我冰雪熬的有马克思，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唯物史观、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；陪我苦熬的还有恩格斯，他给我讲《论权威》目的是针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，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所有制革命的胜利，资本主义只会改变变成社会社会主义，权威原则也不会消失，而且只会改变形式；陪我苦熬的还有大胡子托尔斯泰，他在短篇小说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，通过由佃农发展为地主的帕霍莫夫，由于过分的贪婪，暴得吐血而死，给我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，不多，两米，够埋葬他的尸体就可以了，告诫我们不要贪婪；陪我苦熬的还有莎士比亚、契科夫、鲁迅……我像久旱的沙漠，遇到春雨的滋润，一滴不露地吸收；也像有生以来都处在饥饿状态，



王锡儒 摄

猛然遇到丰盛大餐，拼力饕餮。

阅读，是先哲给我交流，只要先哲没有抛弃我，人类就没有抛弃我，他们哲给了我整个人类。千万年里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地球上的瞬间过客，没有给后人留下处世的智慧，不能代表人类，能代表人类的只能是给后人留下智慧的人。

麻将传到了小站，工友们的业余生活又增添了新的内容——打麻将。业余打麻将，不是喝酒，就是通宵达旦地搓麻将，有时哗啦啦到天亮，临到上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麻将桌，揉着通红肿胀的眼睛，拿上两个馒头，扛着铁锅朝施工点走去，脚步摇晃，步履挣扎。

很多时候，深夜的月光透过窗户的玻璃，麻将的哗啦也穿过窗户的玻璃，惹得我心烦，无奈；很多时候，他们喝醉后倒在站台上，身旁散发着呕吐物的怪味。我站在桥面的栏杆前，防止他们滚到桥下；很多时候，他们从万源县城回来，谈论着哪个小妹漂亮。

多少次，我发出痛心地的感慨，兄弟呀，咱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呀！

多少次，我又无奈地感慨，我的兄弟不这样，又能咋样！他们同情我的耳聋，同情他们的神志虚空。

看书，就要买书。通信工月工资四十二块五，为了买书，我把每月的伙食费控制在七八块钱以下，几个月不吃一次肉。一个星期天中午，我正写作，觉得头昏得厉害，耳鸣加剧，心跳加剧，意识到情况不好，赶忙打开门挣扎出来，刚出房门就昏倒过去。工友们把我送到几公里外的卫生所，医生说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致。

我的床上是书，桌上是书，床下堆的也是书。领导下来检查工作，查看我的书籍，把《世界通史》《中国通史》《马恩列斯全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，集中在一边，说这些是好书，读得越多越好。又把《西厢记》《茶花女》，归拢到一边，说这些是黄色书籍，宣传淫秽色情，应该没收。我辩解，国家没有规定这些书是黄色书籍，《茶花女》是世界名著，大仲马的代表作。领导说我不管他是公母马，写女人就是宣传资产阶级……

领导要把这些书搬走，如同刀剜我的心肝，我摆出拼命的架势吼，你敢动我的书，我就跟你没完，别说你跟我过不去！如果他真敢搬走我的书，我的拳头绝对会砸在他的脑袋上。若干年后，我漂到海南挣饭吃，再回到当年挣扎的地方，遇到这位领导，他已经退休了，满脸的皱纹里透着生存的艰难和处世的委顿。他主动给我解释，说我是非逼着收你的书，我拿工资就得干活！其实，我早已不记恨他了，那是一个时代，记恨一个时代有什么用？

那些年的阅读，为我的文学创作，为我以后到大学教书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### 二

兄弟部门万源通信站电源室老出故障，我当过汽车兵，懂着电池、发电机，读中学时又学了高低压电路，领导要把我调到电源室当电工，这个职务高于干部。

人事室主任找我谈话，听说你在写作？我说业余时间写点东西。主任问你还不给人说想当作家？我说写出名堂了，就是作家啦。主任说你不是说低你，学生是谁想当能当的，咱国家一年光大学文学系毕业的，作家有多少，有几个当上作家的？大学专门培养作家的学生都当不上，你只读了三年中专，还是学业余写几年的，连地球的自转自转都分不清，还想当了作家！别奋斗什么了，作家的没当，连个人的终身大事都耽误了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是个半聋人，说穿了是残疾人，好赖是个铁路职工，在铁路上找不来对象，找个山里女人还是可以的，早早把家安了，生儿育女过一辈子，不要异想天开。我给你谈话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要是把看书写作的功夫用在工作上，说不定还能提拔成干部。要是当上了干部，即使主任是为我好，但我不能接受。

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单位里，你想当作家本身就让别人看不惯。人家都被作家的光环震慑得顶膜礼拜，你竟敢如此狂妄，要大家顶膜礼拜你！确实可以推测出来，几十个人的单位要是出个作家，按比例下来，中国的作家没有一个亿也有九千万。

杜光辉想当作家在单位传播后，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了黑色幽默，成了人们饭余茶后的笑料。

吃饭时，大家围在房檐下扒拉饭食，有工友当着大家的面说：“杜光辉，不忙的时候请个假，到你先在车坟下看看冒青烟？”这话引起人们哄堂大笑。我羞赧、愤怒，差点把饭碗扣到他头上。但我不敢，打起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把我打了也是白打，唯一的办法是找领导，领导也因为我想当作家而不待见我，找也是白找。

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，还写点东西，常常折腾到这副模样。早晨起床，两眼红肿，糜烂如桃，走路没劲。领导看我这副模样，早早就批评你，你夜里干什么去了，没有一点精神？青年应该像早晨的太阳，看看你这样子，哪个青年人？

为了买书，几年没买衣服，一年四季都是公家发的再生布工作服，油腻肮脏，老远就闻到复杂气味。为了买书，我尽量延长理发的间隔时间，头发蓬乱，远看近看都像精神病人。电报员电话员赌咒时常说，我要是怎么怎么了就嫁给杜光辉。

那段时间，我是在低头中过日子的，看书低头，写作低头，走路低头，见人低头，开会低头。我自己都觉得低人一头，一个半神经的聋人凭什么在人前抬头？我的颈椎病都是在那时候形成的。

我觉得，读的书越多越孤独，越想在书里找知音，找到的是更浓郁的孤独，孤独里却充盈自满自得。

写文章发表不了，领导不待见，同事歧视，鸡嫌狗不爱，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本来就神经衰弱，现在更衰弱，整夜失眠。到卫生所开安眠药，医生说一次只能开三天的量，怕有人把安眠药攒起来自杀！我说如果前几年，我还有自杀的念头，现在你发奖金鼓励我自杀，我都不自杀！

多日后，我读到史铁生在一篇文章写的，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！

### 三

读了那么多书，受了那么多苦，产生了那么多感慨要给人说。我只能把这些写出来，用钢笔给稿纸诉说。

我读中专业的是与文学毫不沾边的通信专业，写作的时候，常常觉得词不达意，心里想的写不出来，写出来的又不是心里想的，觉得不满意，撕下来重写，再写还不满意，再撕下来重写。写到天亮，撕了两本稿纸，地上铺了一层，还没写满一张。

上级号召做有志青年，有志青年的标志就是自学英语。领导把打乒乓球的房子腾出来，挂了块黑板，摆了桌子板凳，请了几个高中毕业生。每天晚饭后，把女电话员电报员、男通信工电缆工集中起来学英语。男坐左，女坐右，还有几对有了意思地坐一块，你瞟我一眼，我瞟你一下，眉目传情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我知道人家看不上我，自然不会自作多情，去了几分钟就跑出来，回到房子继续写作。他们还在那里“啊，喂，哦”地念，教室距我写作的地方不到十米，声浪阵阵，传进我的耳朵，尽管听力不好，还能听出话噪。本来就为写不出东西心烦，听到聒噪更心烦。

一天初夜，我正在边写边撕稿纸，有人敲门，起身开门。副书记进来，看到满屋地的稿纸，惊诧地问，你在做什么，把纸撕得满地都是？我说我在写作，写不下去，心烦；副书记说，你都在做有志青年，你因在屋里撕纸，放着光明大道不走……他说了三遍我才听明白，申辩，她们连个请假条都写不清楚，还去学外国语；她们首要的是把中国话学好，写的请英语让领导看明白。再就是你下这么大的力气培养你学英语，她们学成了，能调到外交部当翻译？给她们教英语的老师连大学都考不上，能教出外交部的翻译官？俺老爹给我说，有啥地种啥庄稼，翅膀长出来了再想上天，别成天空想，成了欧文的空想社论。

我趁机把刚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论给他，他哪知道欧文是谁。还真把他唬唬住了，半晌才说，你还真读出名堂了！我又骇唬他，你以后上党课把我请去，你们要是能听懂十分之一，我一年不要奖金。不是我小看你培养的有志青年，我奋斗成家了，她们把英语也忘光了，人也变成了老婆娘！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话确实恶毒，难怪人家不喜欢我。

我写了两三年之后，给西安铁路局的《西铁文艺》投了个短篇小说，很快，一位赵姓编辑回信了，信中写道：“杜光辉同志，你的错别字令人无法把文章看下去。请你以后写作时，每个字都查字典……”

我把信贴在桌子前边的墙上，激励自己。心想，你杜光辉要是能写出获全国奖的短篇小说，人家会用这种口气给你写信？要别人看得起你，你首先要让别人看得起你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当作家是青年最辉煌的梦想。在这条并不宽畅的道路上，拥挤着大批的文学青年，你挤我扛，熙熙攘攘。我当时的文学基础，所处的地理环境，论坛上的人际关系，发表作品的难度，比运动地打破世界纪录都难。尽管我拼命地写，勇敢加不要脸地投稿，每天都企盼着邮递员的铃声，也每天都怕邮递员那句永远不变的话：“杜光辉，你的退稿！”随着邮递员的话，又招来一阵司空见惯的热嘲冷刺。退稿中夹着一张铅字退稿信，有的连我的姓名都懒得写，只在铅字的“同志”前边加个“杜”就行了，还有的连“杜”都没有，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水平，不值得编辑浪费那点墨水。

也有很多退稿信是钢笔写的，几百字，上千字，详细地给我讲小说存在的问题，怎么修改。我把这些退稿信一遍一遍地琢磨，从中思考什么是结构、人物刻画、细节？我至今还记得给我亲笔写退稿信的编辑有：《奔流》的杜道恒、《鸭绿江》的刘元举、《十月》的骆一禾、《长江文艺》的谢克强、《当代》的周显仁、《作家》的宗仁发……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時候的编辑真好，和作者的关系真纯洁！

再有人恶心想当作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就把这些退稿信拿出来，振振有词地反驳，我要是没有培养价值，人家能费那么大的力气给我写信？这不是斗嘴，我真的感觉我是棵文学苗子，有培养价值。

这些退稿信有 1 封、10 封、100 封、200 封、将近 300 封。我望着一寸多高的退稿信，自己给自己发狠，让狗日的退，等退至 1000 封时，老子在退稿信的背面打上方格，写一部中篇小说寄去，看能不能打动他们。

我看到一家报纸介绍，北京有个叫张征的作家，接到 200 多封退稿信，仍然坚持不懈，终于发表了处女作。我苦笑了，我收到的退稿信将近他的一倍，怎么没人关注我？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中说，只要心诚石头都能开出花，难道我对文学的心还不诚？

十多年后，我带到海南闯荡，我丢弃了两年生活用品，但有了这些退稿信一直带在身边，我在海南流浪了全部，终于有了工作，联系当年扶持过我的编辑，有的已经下世，有的健在。那年冬天，刘元举坐在我刚刚分到的单位住房，看到这些退稿信，他亲笔写的就有二三十封，感慨地说，我当了一辈子编辑，写了多少退稿信，唯有你把把这些退稿信保存得这么好。看到这些退稿信，看到你的创作成就，我有了当编辑的成就感！